

26.11

红西路军史料

hongxilujunshiliao

(第五辑)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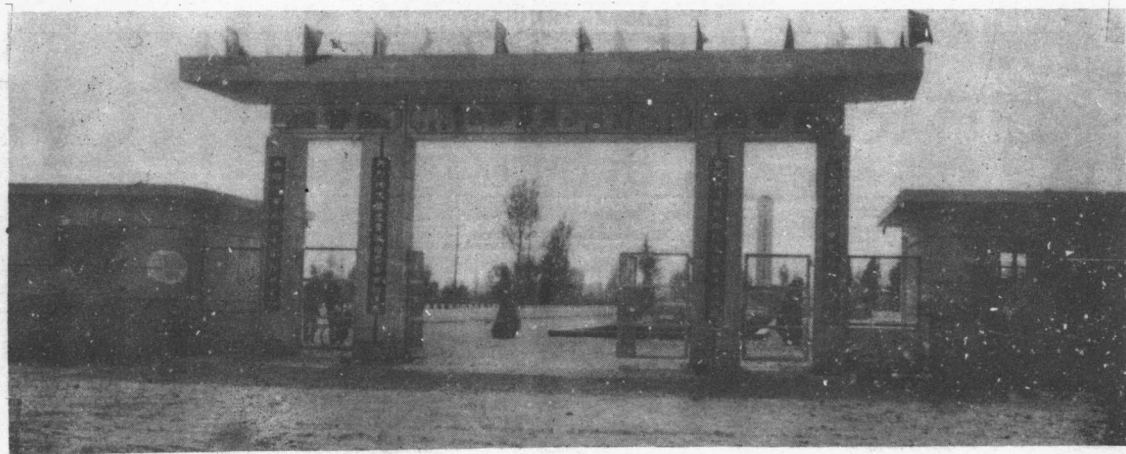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红西路军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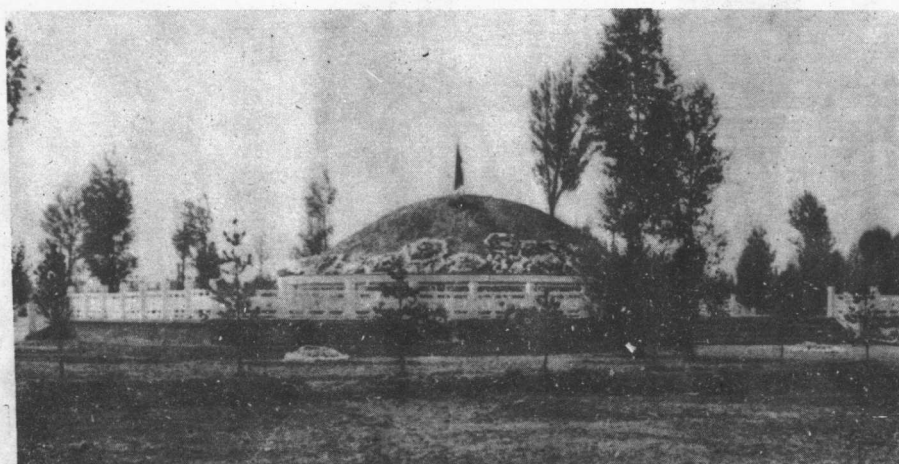
(第五辑)

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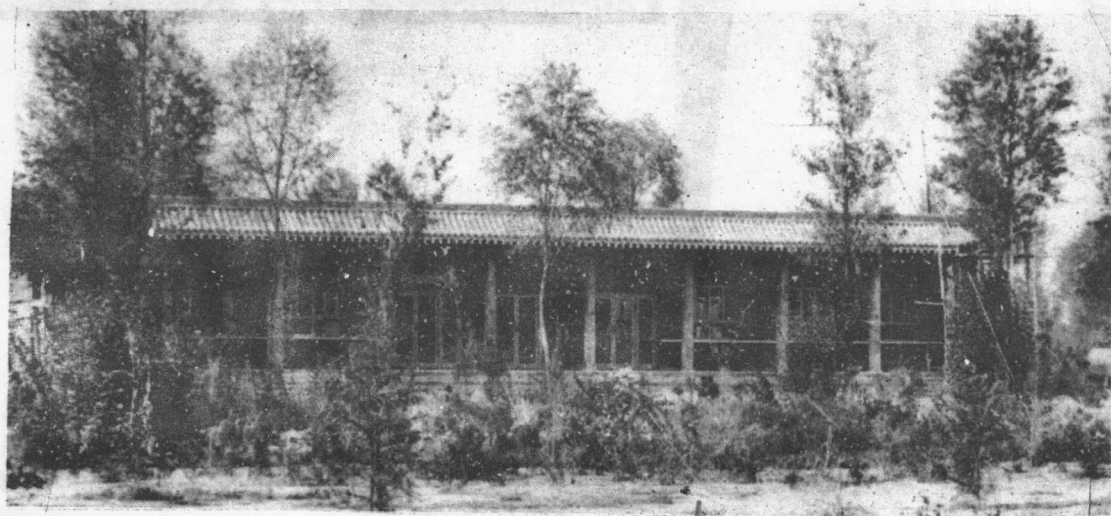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七月



↑ 临泽烈士陵园正门



← 临泽烈士陵园烈士公墓
临泽烈士陵园陈列室 ↓



AWT11/1942/08



↑ 临泽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

← 烈士纪念碑碑文



← 高金城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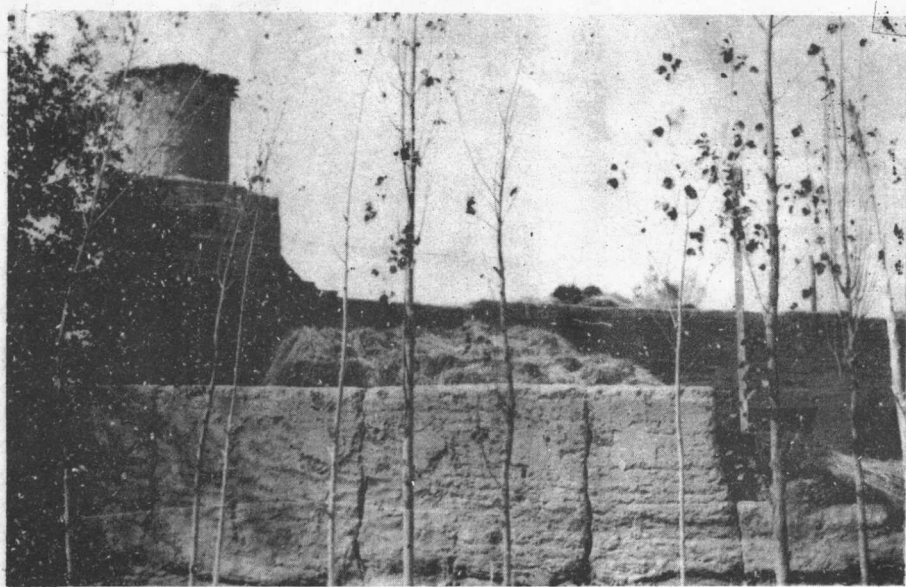
→ 高金城先生纪念塔



→ 王铭五像



↓ 当年红西路军总部所在地——临泽县缪家屯庄



第五辑

目 录

图片介绍

综 述

周恩来与红西路军

.....原树勋 王士炜 徐国友(1)

敌人残害红西路军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办(6)

山丹人民掩护营救红西路军指战员

.....中共山丹县委党史办(22)

血战高台前后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33)

西洞堡战斗中共张掖市委党史办(38)

红西路军在临泽的地方工作

.....濮生荣(42)

红西路军在肃南活动情况

.....中共肃南县委党史办(48)

专 题 报 告

高金城传略中共张掖市委党史办(52)

王泽喜传略中共张掖市委党史办(56)

王铭五传略中共高台县委党史办(58)

艾黎传略中共山丹县委党史办(61)

何克传略中共山丹县委党史办(73)

人 物 传 记

回
忆
与
史
纪

回忆杨克明同志	杨文局 (81)
悲壮的一曲	方 强 (86)
回忆红西路军西征的情况	张达明 (91)
绝境回生——民乐人民是我的亲人	向如沛 (110)
祁连山中——营救徐一新同志纪事	于宗明 (112)
十块银洋见精神	万义元 (116)

周恩来与红西路军

原树勋 王士伟 徐国友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二战”和抗日战争初期，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三人指挥小组”成员。“西安事变”后，又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赴西安谈判，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与红西路军也有着极为密切的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对红西路军所给予的极大关注，贯穿在整个西征始末；特别是在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付诸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为我党保存了一批宝贵的革命力量。

众所周知，红西路军是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命西渡黄河的。尔后因敌我战略态势变化，河西之红军部队折向甘西，肩负“打通国际路线”，建立河西根据地，接通“远方”之重任，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日，奉命组建红西路军，开始了艰难的西征历程。

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实现战略总任务而早已制定的一项战略规划。当时，由于张国焘背离党中央路线，擅自率军南下，折兵过半，在自食恶果之后，被迫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发布“北上令”。其实，张国焘早已知道红四方面军即时应处的战略位置。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朱张徐陈”就曾致电“英洛毛周贺任关刘”：“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电文明示了红四方面军已意识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将无疑落在自己的肩上。“毛周”即日复电：“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欣慰。”这对曾经分裂党中央的张国焘来说，展示了毛泽东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同志那种坦荡谦诚的胸怀和豁达大度的气质。

西征初期，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央战略部署，在洪德城向朱德、张国焘、林育英传达了有关指示，并于十九日电示“徐陈”：“恩来同志对你方行动有如下意见：（一）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分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同时以一部分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二）在甘州占领后，五军在甘、肃两州安西线活动。九军、三十军可在永昌以南地区活动，大大的扩红筹资，准备灭敌。（三）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货物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问题。克服一切通往

新疆方面的交通和气候上的困难，更须控制安西通哈密之交通。”这一电文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对红西路军的行动及部署所采取的慎重态度。

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后，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同志根据红西路军当时所处的战略位置及确保西安后方之安全，致电“毛朱张”，建议：“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张（学良）答应给予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当时，军委主席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成立）正令红西路军西进。但是，军委主席团亦考虑到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完全有利于整个战略部署，即欲改令红西路军继续西进的想法，电示“徐陈”：“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述。”十二月二十三日，红西路军未能全面采纳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徐陈”复电：“我们建议西路军们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如为牵制二马，可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翌日，毛泽东告周恩来：“徐陈因永昌至古浪一条路，气候白天零下三度，夜间零下三十度，马敌集中主力在凉州、永昌线，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之计划。”当时，由于红西路军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一系列的客观条件所决定，未能决意东返。诚然，当时如果能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旨意，迅速东返，其损失或许比西征失利要小得多。

我们不可否认周恩来同志建议红西路军东返之主要原因是策应“西安事变”之后方。后因“西安事变”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也于即日晚释放。是夜，周恩来同志致电“毛朱张”：“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军委主席团亦电告“徐陈”：“仍执行西进任务。”

以始渡黄河后统计，红西路军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八百余人；枪七千余支，均三人一支；子弹十三万余发，人均六发余；非战斗人员占红西路军总人数近半。

“二马”参战人数为新二军马步芳部一万四千七百余人；骑五师马步青部一万四千余人，计正规部队将近三万人。甘、青民团参战人数达四万余人，总参战人数七万余人。被歼灭人数达二万五千余人。

在历时半年多的西征中，红西路军阵亡人员计有八千余；被俘人员九千余，其中被敌人残害的有四千七百余人，被党营救的有四千二百余人。另有自行结伴东返的不足千人；失散、流落的约四千余人。

在红西路军九千余名被俘人员中，有四千余名系马部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后，在祁连山中进行搜捕及诸战斗中所被俘的，占总俘人员近半。

马部对红西路军被俘人员所实施的政策也是颇费心机的。他们对红西路军这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红军队伍无不折服；西征后，马部因无度与这支骁勇果敢的红军部队较量，其实力的削弱与人员的锐减也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为此，马部对红西路军被俘人员首先采取引诱、欺骗的手段，以便尽量减少被俘人员的敌对情绪。如在被俘人员面前显示自己的实力；付出高薪高职聘任；让食手抓羊肉等。特别是对女俘红军进行色情引诱，马部仅在新城花园内就连续上演了三夜的“春宫电影”，逼迫女俘战士观看。对被俘人

员中的高级干部、军事干才采取更为“温和”的“感化”和“优待”政策，以利归顺马部，补充其败损之元气，提高其战斗力。

然而，事与愿违。马部在忠贞不渝、大义凛然的红西路军被俘人员面前，无可是从，暴露其凶残的狰狞面目。为此，红西路军被俘人员有半数以上陆续被敌人残害，健全的、幸免于死的，则被罚做苦役或充补壮丁。

红西路军严明的军纪、顽强的作风和英勇不屈的精神始终如一。行军、打仗，帮助地方建党、建政是这样，被俘以后仍然是这样。因而，使得人民群众、当地土著和各界人士产生了巨大的恻隐之心，以致呈现出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职业、不分贫富、不分敌我的“七不分”的群众性营救。于此同时，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通过统一战线、“西、兰八办”、各界有关人士等多种渠道，采取一系列营救措施，使得四千余名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得以回到党的怀抱。

在当时十分落后的河西走廊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开展营救工作是异常艰难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对盘踞在甘、青的“二马”来说毫无触动，他们唯恐红军占居自己的老巢，动摇自己的统治，反而对红西路军的围剿和残害更为加剧。

事实上，党中央对此早有预见。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就曾电示红西路军：“勿对‘二马’抱幻想。”当时，陈昌浩则认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形势下，“可与‘二马’建立统一战线”。结果，这种幻想被事实所混灭。在党中央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与他建立统一战线是否可靠？”的思想指导下，从自我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救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会见回族人士马德涵和国民党高级官员赵守钰时，就曾委托他们同“二马”交涉有关释放被俘红军的问题。于此同时，先后派我党的张文彬、刘秉琳、吴鸿宾等同志亲赴青海、凉州等地了解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状况，以利进一步拟定营救措施。根据一系列具体情况，周恩来与吴鸿宾在西安会晤时，提出在兰州设立办事处的事宜。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这一提议，遂调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彭加伦开始该事宜筹备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八日，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收容红西路军为已任的兰州办事处，设立于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

一九三七年九月，随着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发展，我党在兰州、西安等地所设立的办事处，改称“八路军办事处”。

在周恩来同志的积极努力和倡导下，“兰八办”与“西八办”不仅是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接待站”、“转送站”，又是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二马”进行据理斗争的战斗堡垒。同时，担负红西路军在西征中所肩负“打通国际路线”的未竟任务。

在西征失利后，红西路军被俘人员中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均被集中关押在西宁、张掖、武威等地。被俘战士则大部分编入国民党补充团，转送至兰州九十七师，以达“受训感化”之目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电示“兰八办”：“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五干部在九十七师新兵营，速营救。”随即，“兰八办”通过上层统战

关系，从九十七师及西宁等地索要回一批红西路军被俘的中、高级干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马步芳将甘、青被俘红军二千余人合编为新兵团，在送往第一战区途中，“兰八办”再次出面营救，未果。当即，谢觉哉同志向“西八办”党代表林伯渠同志联络，最后终得全部营救。

当时，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斗争最为复杂的武汉办事处主持工作。武汉失守后，又迁至重庆。“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赴西安谈判期间，迫使蒋介石释放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当时，甘肃省民政厅厅长施奎龄是周恩来同志南开大学的学友。甘肃省主席贺耀组又与谢觉哉同志是同乡旧友。这样，“兰八办”在兰州开展工作就比较便利。在周恩来、谢觉哉的疏通下，他们都为营救被俘红军做了些有益的工作。我党的挚友高金城先生就是通过贺耀组与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取得了联系，在张掖建立了“福音堂医院”，以此为掩护营救转送红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达二百余名。

“兰八办”对有关统战政策及营救红西路军的问题随时电请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均做慎密的分析，即刻回电指示。

时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周恩来同志亲自与国民党当局据理相争，最终迫使国民党当局将由青海转押南京反省院的红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宣传干事吴仲廉、总部供给部政治干事陶万荣等同志释放。

自红西路军开始西征至转战失利之后，周恩来同志一直把营救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工作紧系在自己的心头。如：

“一九三七年二月，党中央派刘伯承、张浩率‘援西军’由淳河、三原地区出发，开始向河西挺进。此间，周恩来同志再次委派马德涵先生在张文彬、马宪民同志陪同下武威与马步青交涉，提出‘不要杀害红军被俘人员，要求释放扣押在武威的红军被俘人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再一次同国民党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商榷，并电告中央：‘河西问题催顾速答’。党中央接电后即复周恩来同志：‘以最快速度办妥’。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向顾祝同、朱绍良交涉，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周恩来同志再次委托马德涵与青海省主席马麟交涉，停止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残害。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再次派遣张文彬同志赴兰州，交涉被遣送到拱星墩集中营内的一千三百多名被俘红军的归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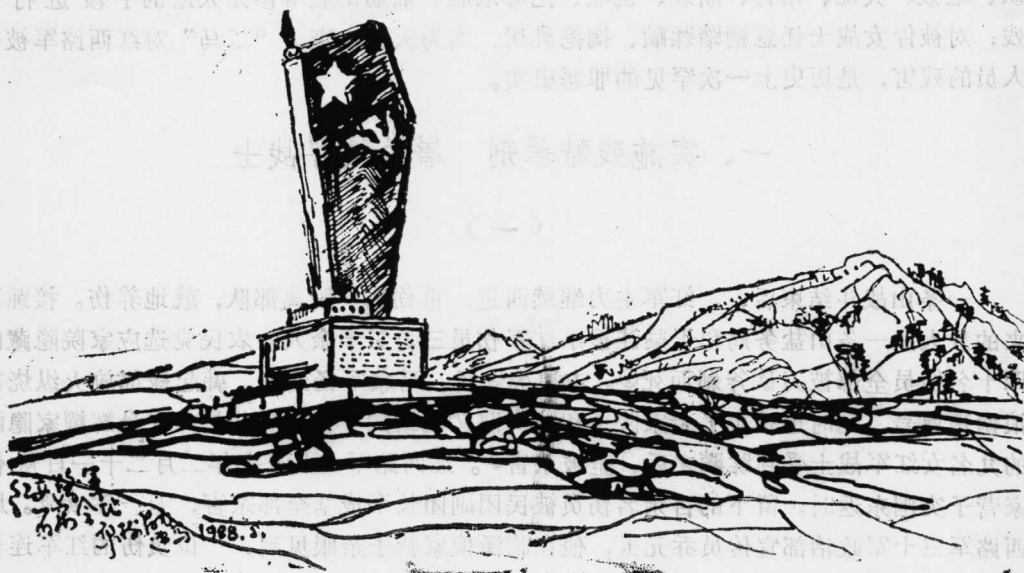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再次派吴鸿宾同志赴青海了解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处置和待遇等情况。”

由此可见，周恩来同志与营救红西路军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一条十分清晰的“营救链”。这条“营救链”展示出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对红西路军的无限关怀，

这是我党革命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营救史实。

参考资料

-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血战河西走廊”）。
- ②张掖地委党史办：《红西路军史料》（一、二辑）。
- ③红西路军有关“电报及文献”。
- ④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委会：《谢老在兰州》。
- ⑤吴辑庠（原马步青骑五师参谋处上校处长）：《交待材料》。



原树勋 图

敌人残害红西路军

被俘伤病失散人员的情况

中共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盘踞西北的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对一九三六年十月奉命西渡黄河，建立河西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红西路军所属五军、九军、三十军二万一千八百余人进行猖狂地围追堵截；对战斗失利不幸被俘的一万多名红西路军指战员实施枪杀、活埋、刀砍、炮轰、火烧、吊打、断颈、挑喉、挖心取胆、抽筋剖腹等惨无人道的手段进行摧残；对被俘女战士任意糟蹋蹂躏、掏挖乳房，实为灭绝人寰。“二马”对红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残害，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罪恶史实。

一、实施残酷暴刑 屠杀被俘战士

(一)

一条山战斗结束后，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重伤病员脱离部队，就地养伤。接踵而来的敌人从一条山盐务局和干柴洼搜杀红军伤员三百三十余人。农民党选应家院隐藏的四十名伤员全部被刀砍斧剁而死^①。古浪失守后，马家军杨德霖、韩起禄部放火纵烧古浪南街商号，同时也杀害了金家院子和北街旧文化馆的一百多名伤员，在孙耀家隐藏的九名女红军战士受到蹂躏之后，全被杀害^②。红西路军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时，留下的百余名伤员被民团副团长李成基全部杀害，无一幸免^③。原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宣传员乔元玉，他在临泽倪家营子亲眼见到，一位负伤的红军连长被吊到山庙前的一棵树上，扒下衣裤，用刀剥皮致死〔附件一〕^④。原红九军二十七师战士朱友德回忆，梨园口战斗后，不少同志身负重伤，不少同志业已牺牲，但他也负伤而倒在血泊中，亲眼看见马家军用大刀乱砍乱杀，负伤的同志几乎全部砍死，而他是当时幸存者之一〔附件二〕^⑤。高台城失陷后，敌人烧杀达七天之久，把数百名伤员排成队用马刀砍死〔附件三〕^⑥，红五军张护士长面对敌人的凶残，坚贞不屈，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城内（今县政府院内）的一棵老槐树上^⑦。

马家军走后，当地民团又来剥死人身上的衣服，有的尸体被剥的精光。老红军赵天然亲眼看到四具女尸被剥的一丝不挂，暴尸横野〔附件四〕^⑧。

(二)

西路军西征历时一百八十八天，与敌血战七十余次，转战景泰、古浪、武威、永

昌、山丹、张掖、临泽、高台、安西等地，在人员锐减，兵源无补，气候严寒，给养奇缺，孤军深入，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重创敌军。由于战局逆转，使大部将士战死沙场或落入敌手；部分流落河西各地，除被当地人民群众掩护、营救外，其余均被搜捕而遭到残害。

当时，马家军与当地民团、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勾结，进行了大规模清乡坚野，围剿搜山，加以搜捕迫害。据一九五九年张掖县委五人小组材料记录，伪保安团团团长罗兴章曾亲自带领民团清乡数次；副团长张成仁搜捕我西路军将士五百余人，亲自活埋西路军战士及保护红军人员十四人。民乐县民联乡高寨村恶霸地主高凌汉，把两名失散红军骗到馒头山深沟，被他养的恶狗咬的遍体鳞伤，不醒人事后，用枪打死〔附件五〕^⑩。倪家营子财主李成喜，将一位女红军留给他儿媳不满两个月的婴儿，倒提两腿用刀分成两瓣〔附件六〕^⑪。临泽蓼泉乡刘家墩子甲长刘事恒，把收藏在刘宗福母亲家炕洞的四个小红军，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榔头砸头，直到脑浆四溢，鲜血横飞，惨不忍睹〔附件六〕^⑫。民乐县东乐村地痞刘生福、刘仁德（枪决）纠集十一人，将携带长枪一支、短枪一支、大烟十两的四名失散红军，以留宿为名，夺走枪支，密谋暗杀^⑬。恶霸张兴智纠合兄弟数人，把流入该村的三名红军战士追赶围打，用木棒活活打死，搜走了身藏的两个包袱〔附件五〕^⑭。临泽县赵家湾子恶棍赵延典，把在农民夏季看菜的土房子里避难的两名红军（一男一女）剥取衣服，掠走大烟、白银，洗劫一空，一夜过后冻成两俱僵尸〔附件六〕^⑮。民乐县李寨乡三寨村的回民马福成，用土炮轰一位红军战士的胸脯，这位战士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口号英勇就义〔附件五〕^⑯。

（三）

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春，正是天寒地冻风雪弥漫的季节。西路军被俘战士身着单衣，在敌人驱赶下，被押送韩起功旅部。西路军被俘人员在解押途中被随意毒打、戳杀。总部骑兵师政委张云，在押往张掖的路上遭到民团副团长关秉仁的杀害；民团副团长韩绍华，在押送被俘人员途中，亲自在梨园山峡用刀杀害了五名红军战士，同时还指示部下杀害了另外三十一名被俘人员^⑰。

被押到营部的被俘人员，韩起功受马步芳指令，从甘肃张掖经扁都口、俄博、大梁、黑石头、大板山、桥头镇等地解押到西宁。途中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荒野里，被俘战士昼行荒野，夜宿露地。在敌人的刺刀皮鞭下，有的为敌人抬伤员担架，力尽气竭而被砍死；有的穿着不足以抵御风寒的衣服而冻死；有的喝稀糊糊不足以维持生命而饿死；有的不堪忍受欺凌奋起反抗而被杀害；不少因伤重、病危而行走缓慢的即遭屠戮。沿途红军战士尸体遍野，狼狗争食的凄惨情景目不忍睹。据幸存的原西路军战士王大英回忆，在门源流沟见到八名红军理发员，一个因走不动被活活砸死，七个被拉到河滩用刀砍死〔附件七〕^⑱；有的伤员走不动将肠子抽出拴在马尾巴上活活拉死。邓秀英说，他亲自看到敌人把一男一女两名战俘手脚绑住，全身包上浇了油的棉花，活活烧死，被烧者疼痛难忍，而敌人却围观取乐“好看哪！好看！”〔附件八〕。

⑳。为练习射击、刺杀，将红军战士当靶子，打死后，凶手居然宣耀说“我的枪法怎么样？”〔附件四〕㉑。马家军把杀人视为游戏，杀的多者为英雄。在解押途中的被集体虐杀的战俘亦屡见不鲜。路宿洪水时，一晚上就暗杀了二十多人〔附件九〕㉒。原西路军战士贺彦太说，他们被押到门源后，敌人在夜间把伤员捆绑起来，扔在几十辆（每辆装五至十人）木轮大车上，拉到东门外窑沟一带杀害〔附件十〕㉓。经查证在门源东门外和麻尼旗杆等处，光活埋就达一百多人㉔；据亲历其事的敌人交待，他亲自参加了由武威经永登解至西宁的战俘被他们深夜活埋在永登东山沟〔附件十一〕㉕。据《青海日报》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报道：从张掖押至西宁的二百九十五名战俘中，沿途仅冻饿而死的就有二十七人，几乎占百分之十。

（四）

管押在张掖的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年轻强壮的被编入“补充营”服苦役；老弱病残者在张掖市内东校场㉖、王母宫㉗、牛王宫㉘、下滩子㉙、十里行宫㉚、北城墙下㉛、义园广场㉜、韩家花园㉝等地全被杀害活埋。从张掖的现存材料看，韩起功与民团枪杀红军三百八十人，烧死五十六人，活埋一千六百三十三人，共计三千零六十六人。其中以东校场活埋人数最多，因而被群众称为“万人坑”。

据当地农民李成文说：东校场有二个长四丈、宽三丈、深六尺的大坑。一天深夜，敌人在这坑里活埋了数不清的红军。第二天拂晓，大坑两侧的鲜血象水一样流向公路和周围的地里，看见地上甩满了军帽、背包、饭碗和鞋。有一个女红军和两个孩子，浑身血淋淋地从坑里爬出来后，又被敌人拉去埋掉。老红军女战士马玉莲回忆，北城墙下面也有二个宽一点五丈，长六丈、深六尺的“万人坑”都活埋着红军战士。

西路军被俘人员押到西宁后，马步芳指使他的亲信逐个进行审查，把年轻体壮的编入“补充团”集训和其他军队服役。对伤残体弱的和一些干部不断地暗杀。他们为了掩人耳目，逃避社会舆论的谴责，暗中指示手枪团、执法队、传令队，在夜间秘密杀害红军时，要做到不点灯、不鸣枪、不留痕迹，不让逃脱一人的命令，把活埋红军的现场要收拾的干干净净。

敌人虐杀红军之前，先要装出一副人道主义的样子，把被俘红军集中到一起假惺惺地说，现在送你们回家，你们都是伤员，送你们到医院等等。红军被欺骗押到刑场后，敌人便原形毕露，挥舞大刀、镢头、铁铣等凶器，对着手无寸铁，绳索捆绑的伤残红军进行疯狂屠杀，一个人一刀或一棒，不管是死是活就推到坑里掩埋。一层土，一层人，埋一层死的，填一层活的，分六、七层掩埋，手段极为毒辣〔附件十二〕㉞。

从“万人坑”里逃出来的人，每谈及当时的凄惨场面，就声泪俱下。西路军老战士黄科林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人。敌人把他同战士一起活埋，到了半夜他与一个女红军从坑里爬出来挣扎着跑到一老百姓家，才算得以活命〔附件十三〕㉟。

原马步芳上校参议陈秉渊揭露：一九三七年三月七日，在高台被俘的红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年鸿才（编者按：年鸿才为红五军四十三团参谋长）及骑兵团团长马福山、三十九团教练朱锦堂（编者按：即朱金昌，为红五军三十九团政治处主任）、指导员杨嘉明等大

十八人被杀于青海西宁的南山根^④。解放后，西宁民政部门搜集挖掘烈士遗骨时，“在杨家滩挖出五十四具；苦水沟挖出二百多具；东塔院挖出二百五十六具；板登台挖出二百多具。以上共八百多具。而大牙合、小牙合两处被害最多，尸骨被洪水冲去，故不知其数”^⑤。

历史是无情的，当年那些杀害红军的刽子手，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张掖地区在一九五八年逮捕判刑的罪犯就有二百六十七名，其中判处死刑的五十名，死缓的四名，无期徒刑的二十七名，有期徒刑的一百八十五名^⑥。现已初步查明，在红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被马家军枪杀、活埋、火烧于张掖、青海两地的死难烈士竟达四千六百四十三人〔附件十四〕^⑦。

二、被俘战士受磨难 集中营里服苦役

西路军被俘战士幸存下来的大都被囚禁在各集中营里强制服苦役。据亲历其事的马敌爪牙和一些被俘战士回忆，武威马呈祥补充旅第三团拘禁的一千二百余名红军被俘战士，由团长王绳祖，副团长杨明亭负责到永登苦水沟修路、造营房。武威第二监狱管押着十八岁以下的少共二百六十余名改编成“童子团”，充当马步青骑五师的仪仗队。张掖韩起功搜捕二十岁以下的四百名红军战士编为“补充营”。青海新二军补充团二千八百五十多人，义源工厂六十九人，陆军医院四十六人，毛顺德毛厂五十多人，中山医院二十多人，一百师电台六人，大通煤窑八人，修械所三人，合计约三千一百余人，都在受苦役，经受着非人般的待遇。

一九三七年春，马步芳将二十五岁以下的被俘战士编入“补充团”。“补充团”是一个强制被俘红军战士服苦役劳动的组织。一九三七年九月，“补充团”调往张掖与韩起功“补充营”一起修飞机场，修甘新公路、植树。尔后，马步芳又将“补充团”一营调回西宁改为工兵营（亦称森林警察局）。同年九月，该营一、二连调大通县郭麻寺伐运木料，三、四连到循化县中吾、占群地区伐运木料。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底调至循化县赞卜乎地区垦荒种地约一千七百五十亩，修庄廊六十个，盖房屋三百间，黄河边修水车七架。一九四三年底，马步芳把红军战士开垦的两千七百五十亩地和庄廊、房屋吞为私有，并效仿封建帝王，把黄河以北的封给儿子马继援，黄河以南的给了他的私生子马宗德。一九四四年初至一九四六年底，马步芳说“工兵营”的红军战士在循化、享生地区还修铺面、住房二百间，学校一所、油坊一处，水磨两盘、清真寺一所。由于长年繁重的劳役和疾病的折磨，解散时原有的四百余人，只剩了二百五十余人〔附件十三〕^⑧，几乎近半人死于非命或逃跑出去了。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补充团”二、三、四营在西宁修建惠宁桥一座，昆仑中学校舍二千间、乐家湾铁骑沟窑洞；九月调至张掖修飞机场；一九三八年二月调往门源县修宁张公路卡子沟至下大板二十七公里的一段公路，之后“补充团”一部交兰州国民党九十七师，顶替马步芳当年应征的一千五百名壮丁。

红军被俘战士在集中营服役期间，每天早上七点出工，晚上七点收工，中间除吃饭